

■ 聚焦

为人性的善良不懈歌唱

——略评凌鼎年新集《庚子年笔记》

□ 李晓东

如今“头部”的微小小说作家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少人不仅有自己的题材领域，而且有自己的价值指向——或褒或贬，关注一点。如戴希于日常细节中体会生活的滋味，安琼将笔触对准上海市井画大都市世态人情，蔡中锋用幽默和机巧针砭时弊，申平以动物喻人弘扬别样的精神……作为资深微小说大家的凌鼎年，数十年躬耕文苑，创作宏富，林林总总，却可归纳出明显主题，那就是不懈探索人性的复杂与深刻。现试以其新集《庚子年笔记》中篇目为例分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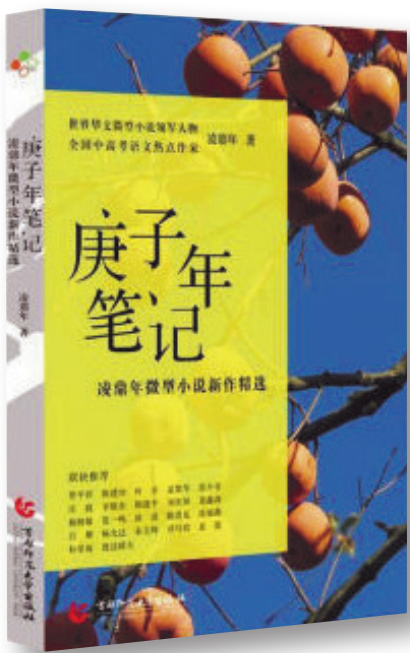
我与凌鼎年先生有一共同点，都有较长期的煤矿生活经历。他在徐州的煤矿工作20余年，我则是第三煤矿工人，自小在山西路安集团长大。爷爷、父亲、弟弟、妹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我家一直有人在煤矿工作，煤炭黄金期如此，衰败期亦如此。我18岁上大学离开矿上，但这个亲人、同学、朋友依然在这片土地和这个行业里生产生活。由于行业的危险性，煤矿人经常要面对伤残甚至生死的危险，因此，养成一种独特的生命观，即看淡生死。我小时候隔段时间就会看到女人在矿招待所门前躺地痛哭，不用问，肯定是儿子或丈夫在井下工亡了。年幼的我眼见既多，不以为奇，不以为怪，也不以为悲，同时却一直暗暗担心，害怕爸爸在井下出事。既习惯了生死无常，又更知生命的脆弱与可贵，种植在每一个煤矿人的心底。有人说，除却生死，其余都是小事，从生死中凝练出的价值观，当更其深切。《庚子年笔记》中，多有涉生死之篇。

一开卷，《劫道》便将金枝玉叶的柳小姐送到了生死关头。无论私塾先生的“真诚”，还是小姐的镇静，抑或管家的机智，其实都于事无补，真正使局面化险为夷的，是未出场的柳老先生多年前的善良。孟子云“人之初，性本善”，即使为生计所迫落草为寇，依然心存报恩之心，动物性依然受到社会性的约束，原欲依然服从于善良的本性。

但人心向善也应有边界和节制，正如毛泽东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边”的，过犹不及，甚至可能变质为愚昧和非理性。凌鼎年作为有世界眼光的作家，对人性善恶之界限有着清晰的把握，并通过微小说来表达之。《禁燃指牌》借佛教故事，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任何善举，都不能以损害普通民众的生存为限。虽未明示，小说却对宗教极端主义进行了形象而严厉的批判，体现了一位著名作家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之善恶是随环境条件之变化而变化的，好的制度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坏的制度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当制度无法对人产生有效约束时，人性中自私、贪婪、不负责任等恶的一面便会显现，甚至于膨胀。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以一本书、七个人物的故事阐述了明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明崇祯十七年》则用一篇微小说，呈现明朝灭亡时的世之乱与人之恶。不仅明朝高官拥有巨额财富不拿出来为国所用，坐视王朝灭亡、皇帝自尽，而且李自成部下的高级将领一进京城，马上腐败，争抢金银、房舍、美女、骄奢淫逸，进得京城却守不住，为清军所败。数百年后，毛泽东自我感慨和警醒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不要被退回来”。

凌鼎年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婺城”是他的“邮票”，正如鲁镇之于鲁迅一样。没有历史烽烟里的大奸大恶，当代之婺城，是东南发达地区的一方土地，你我般普通人栖息于斯，歌哭



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今不少所谓“文化空间”的本质。但有经济考量并非不应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事物复杂的两面性，正是多面人性的外化。当然，利益考量之下，依然有真情存在，如同雪下的笋芽。《匾额收藏家》里，一对优秀的夫妇因志趣不同而分道扬镳。小说没有学步“一兴一衰”，负心者必然后悔这一民间故事般的固有模式。分手后，男收古匾女经商，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虽不比翼，也算齐飞。奇特的是，两位众所瞩目的成功人士，并未如常见桥段般红颜蓝颜纷飞，反而各自单身二十年。文末，男方提议复婚，“白沁沁有些心动”，意在言外，余音绕梁，两位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相守的，便是与利益相连接但不为利益所吞噬的真情与初心。

作为成熟的微小说作家，凌鼎年取材广泛，“各体皆工”。《庚子年笔记》一集，即分“历史篇”“宫廷篇”“文化篇”“近代篇”“异域篇”“民间篇”“武侠篇”“情感篇”“动物篇”“荒诞篇”“法制篇”共11类，可以说古今中外、天上人间、理性荒诞、拟物拟人，无所不有，但其主题仍紧紧围绕着人与人性。荒诞派文学本意指以荒诞的手法表达人类生存的无奈，凌鼎年借此概念而另有发挥。《三个和尚》《农夫和蛇》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是传统微小说的精品，凌鼎年从两个方向反其道而用之：以“民主”手段解决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但团结协作的裂痕却越来越大；农夫的儿子自恃武功高强，便故意重蹈“父”辙，让毒蛇咬了一口，结果毒性发作，先产生幻觉，而后死去。“情节纯属虚构”的背后，是对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人性有情的热讽。

讽刺小说是小说家的重要成员，尤为鲁迅所称赞。凌鼎年以深入的生活阅历、深厚的人文关怀、深切的悯人之心、深沉的创作态度，对人“皮袍子下面的小”做了撕破和展出。有时，他会以动物喻人，仁孝之士、狡猾之徒、巧言令色，在狮子、蝙蝠、猴子身上上演，却可让读者“对号入座”窥见出世的种种。

文学是人学，既包括人学是人文之学，是关爱人、赞扬人、弘扬人性之善良的艺术形式；同时，文学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匕首、投枪、手术刀，承担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社会功能。微小说有小说属性、杂文属性，也有新闻属性，在变动不居、生动鲜活现今社会，产生着空前而独有的作用。

凌鼎年中装缀语，一派吴中风雅，创作时时以笔为刃，剖出灵魂的深刻与复杂，而又以宽容待之，文学大家的责任、情怀、风范，汇而为一。

于斯，同样展示出千人千面的丰富复杂。凌鼎年近取诸身，以周遭人与事，发掘人性与国民性。《编撰（婺城名门望族）一书》，以鲁迅杂文的笔法，漫画式地活画出一段时期以来“修族谱”“争名人”，编修真假难辨的所谓“地方志”等假文化之名行名利之实的风气。表面上，小说针对的是攀高枝、乱认祖宗的市井众人，深层意指却在编撰此书的金水木，特别是他借传敛财的不齿行为。

婺城地处东南，如《红楼梦》所言，是“人间一二等富贵繁华之地”，古代如此，于今更盛。经济发达带来的是文化兴旺，及今，古物收藏越来越为人所好。传承传统优秀文化本是好事，但人各有心，人各有志、人各有面，其中折射出的复杂人性，令人掩卷深思。《“一根筋”的梦想》活化将要倒塌的旧房子，变其为艺术空间，一派清雅，仿佛回到《浮生六记》或袁枚“随园”的时代，背后却是各怀心思，经济利益的算计把表面的风雅一句话就击穿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今不少所谓“文化空间”的本质。但有经济考量并非不应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事物复杂的两面性，正是多面人性的外化。

当然，利益考量之下，依然有真情存在，如同雪下的笋芽。《匾额收藏家》里，一对优秀的夫妇因志趣不同而分道扬镳。小说没有学步“一兴一衰”，负心者必然后悔这一民间故事般的固有模式。分手后，男收古匾女经商，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虽不比翼，也算齐飞。奇特的是，两位众所瞩目的成功人士，并未如常见桥段般红颜蓝颜纷飞，反而各自单身二十年。文末，男方提议复婚，“白沁沁有些心动”，意在言外，余音绕梁，两位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相守的，便是与利益相连接但不为利益所吞噬的真情与初心。

作为成熟的微小说作家，凌鼎年取材广泛，“各体皆工”。《庚子年笔记》一集，即分“历史篇”“宫廷篇”“文化篇”“近代篇”“异域篇”“民间篇”“武侠篇”“情感篇”“动物篇”“荒诞篇”“法制篇”共11类，可以说古今中外、天上人间、理性荒诞、拟物拟人，无所不有，但其主题仍紧紧围绕着人与人性。荒诞派文学本意指以荒诞的手法表达人类生存的无奈，凌鼎年借此概念而另有发挥。《三个和尚》《农夫和蛇》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是传统微小说的精品，凌鼎年从两个方向反其道而用之：以“民主”手段解决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但团结协作的裂痕却越来越大；农夫的儿子自恃武功高强，便故意重蹈“父”辙，让毒蛇咬了一口，结果毒性发作，先产生幻觉，而后死去。“情节纯属虚构”的背后，是对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人性有情的热讽。

讽刺小说是小说家的重要成员，尤为鲁迅所称赞。凌鼎年以深入的生活阅历、深厚的人文关怀、深切的悯人之心、深沉的创作态度，对人“皮袍子下面的小”做了撕破和展出。有时，他会以动物喻人，仁孝之士、狡猾之徒、巧言令色，在狮子、蝙蝠、猴子身上上演，却可让读者“对号入座”窥见出世的种种。

文学是人学，既包括人学是人文之学，是关爱人、赞扬人、弘扬人性之善良的艺术形式；同时，文学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匕首、投枪、手术刀，承担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社会功能。微小说有小说属性、杂文属性，也有新闻属性，在变动不居、生动鲜活的现今社会，产生着空前而独有的作用。

凌鼎年中装缀语，一派吴中风雅，创作时时以笔为刃，剖出灵魂的深刻与复杂，而又以宽容待之，文学大家的责任、情怀、风范，汇而为一。

■ 百家品书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解读和诠释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月出版)，不失为对饮誉中外的一代文学大师的一种追思与敬颂。

国内外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已出版多部，其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凌宇撰写的《沈从文传》，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沈从文人生历程和文学世界的学术专著。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金甫甫教授编著的《沈从文传》，在完整呈现传主昔时生活环境和时代风貌的同时，准确传递了传主作品的文学理念和审美风格。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撰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和《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全面回望和细致书写了沈从文生命发展中的文化故事，成为近年国内学术界关于沈从文研究的权威著述。但最早以传记形式对沈从文予以审视和评价的，则是被丁玲誉为湖北“昭君”的聂华苓于1971年用英文写就的《沈从文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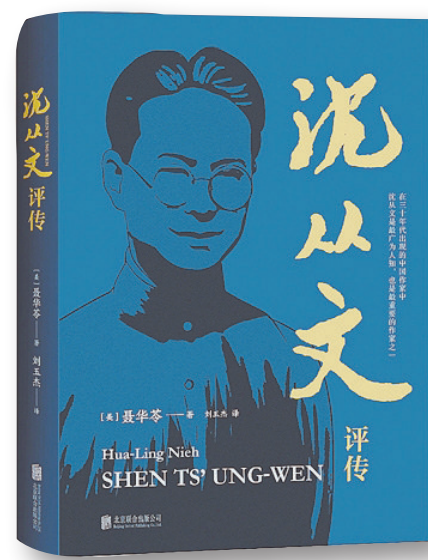
评传一般是依循传主的生平顺序进行梳理和记述，在叙述中植入评论和阐释，以叙带议、叙议结合，侧重对传主的生平事迹进行阐述和评判，是一种带有学术研究色彩的人物传记。以“三生三世”经历加身的聂华苓，一直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作家”，“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我仰望的天空”，因而在《沈从文评传》中一方面概要描摹了沈从文的殊异旅痕和动荡年代，另一方面从美学层面和艺术角度深透分析了沈从文作品的主题意蕴、审美风格和表现技法，并以此为依据管窥沈从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从正面肯定和赞誉沈从文文学成就的当代学者并非始自聂华苓，置身海外的聂华苓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她运用现代主义理论方法审视和揭橥沈从文及其作品，深邃独到地发掘和阐释沈氏作品的题旨要义和美学特点，鲜明指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与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存在着诸多相似性——“局外人”基本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价值的世界之中，“乡下人”则完全生活在一个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环境里，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然生命力。“乡下人”既蕴含着沈从文对社会的洞悉和对身份的认知，也昭示出他的价值准则和文学立场，其作品所体现的对淳朴良善的执着追求、对卑污丑陋的不懈抗拒、对复杂命运和诡异人性的坚韧探寻，均是“乡下人”社会身份的外化与折射，“乡下人”这个概念在沈从文那里代表着旧中国弱者形象，与城市文明所塑造的强悍形象构成巨大反差，也正是由于沈从文秉持“乡下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才使其作品跨越语言阻隔穿越时空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沈从文作品以20世纪初湘西社会历史生活为素材和背景，表现了湘西社会底层的悲欢离合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其作品通过对原始湘西的文学描绘和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艺术思忖，重塑并强化了诗意的中国形象，特别是其作品把对现实人生的追问和对战争引发的社会混乱的思考提升为形而上的悲剧层面，这就使其作品彰显出中国在顺应现代化潮流中所呈具的本土化样貌、所充盈的东方古国的文明色彩，因而其作品不仅受到海外读者的青睐和欢迎，而且深受西方学者的认可和追捧。这位天才文学家的坎坷创作道路，及其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开创，为世界文学注入了丰赡且新鲜的中国文学经验，包括聂华苓在内的海外作家学者在沈从文独特的叙事模式中寻找到新的灵感，并与西方盛行的文学理论相结合，演绎出新的学术发现和学术创见。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著名的文体实验作家。正是他的意象和象征手法，使得他的文字铺陈具有了诗歌的密度与质感。在书中，聂华苓以《夫妇》《柏子》《静》《萧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作品为例，对沈从文文学

牵系和承载半个世纪的文学情缘

——评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

□ 刘金祥



创作的意象表达和象征手法做了细密精微的阐发和疏解，认为“沈从文的‘单纯’和‘平铺直叙’，是经过艺术的选择、安排才最终完成的”；指出“沈从文的句子有时可能看起来很笨拙，很随意，但它们也因此有了腔调，使主题隐藏在意象中”。在深入解读文本和深度剖析结构的基础上，聂华苓对沈从文创作做出总体性概括：“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总能散发出一种象征性的五光十色的效果，他不断实验和发展多种文学形式，以此拓宽自己的文学之路，同时也想由此将民族自豪感传递给正在迅速觉醒中的中国民众。”

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湘西凤凰充满野性的原始况味和神秘的地方传说，构成了沈从文早年成长的独特环境，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精神母体。可以说，沈从文创作的《边城》《萧萧》《湘行散记》和《长河》等作品，既与20世纪中国波谲云诡的历史迁变紧密相连，更与人情朴拙、地域粗犷和风物奇异的古老湘西密不可分。湘西不仅是乡土中国的表征与缩影，也是沈从文作品诸多人物律动自然生命力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始终萦绕在聂华苓的脑际与心头，1971年美国纽约传记出版社邀请聂华苓撰写一位中国作家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沈从文。当然，聂华苓在海外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为其撰写《沈从文评传》提供了诸多便利。凝结着聂华苓心血与智慧的《沈从文评传》，50年前就在美国出版发行了，近年几经周折与辗转终被译成中文并在大陆出版，了却了聂华苓的一桩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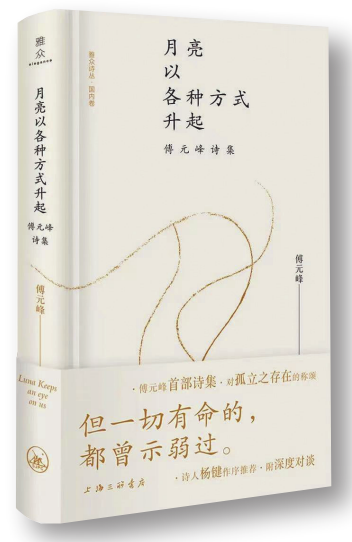
经过岁月泽润与时光淘洗，《沈从文评传》依然散发着奇异的魅力，其牵系和承载着半个世纪的文学情缘，引领读者再次返回氤氲自然天性的湘西边城。《沈从文评传》全书十一个章节、十五万余字，除了前言和正文外，书中还收录了《乡下人沈从文，1984》和《与自然融合的人回归自然》两篇附录。两文从不同视角回眸和追忆了聂华苓夫妇与沈从文相见相知的往事，使读者深切地体会到聂华苓“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的内心告白。聂华苓的出生地武汉和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同属于荆湘文化圈，久远深湛的荆湘文化传统中的九死不悔的精神气质，赋予了二人刚直坚毅的文化品性，正是相同的文化品性使得二人在心灵碰撞和灵魂交流中获得默契。50多年前，聂华苓以一部《沈从文评传》寄寓文学情思、慰藉孤独心绪，烛照自己寻找文化之根的精神之旅，使人们对营构湘西恬淡静谧诗意图景的沈从文有了感性认知，而在倡导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当下，这部湖北作家写湖南作家的心性相通的人物传记，将引导读者领悟凤凰之子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体悟漂泊海外的湖北“昭君”浓郁的寻根情结。

■ 三味斋

取诗的孩子，请等一会

——读傅元峰诗歌札记

□ 育邦



傅元峰是大学教授，是具有卓越批评才华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诗人。但转念一想，我以为他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学者。与他相识十几年来，我有意或无意地注意到他的目光会在这个世界上人与物上面停滞与迟疑。从他羞涩的脸庞和语言的刀剑中，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一位隐匿诗人的气质与光芒。

上海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傅元峰的诗集《月亮以各种方式升起》，证实了我许久的猜测。元峰的诗歌全然不顾已有现代汉诗的传统和秩序，以令人惊异的方式突然站在我们面前。元峰的诗歌是语言的蛇行，这种蛇行有时迅疾无形，有时虚与委蛇。它不再是规规矩矩地起承转合，不再是铺陈与升华的老路，不再是“赋比兴”的诗歌方。他走的是那条陌生而新异的崭新之路。

诗集中有一首诗叫《雪》，这首诗歌充斥着诗人家乡所说的方言。作为个体而言，诗人是一位说着在一定范围内可理解的方言诗人。这种诗歌是一种隐匿，制造了一种悖论——一种拒绝(普通话)公共话语理解的姿态。它只为了呈现一种“写诗”的状态，效果却是顺理成章、平滑自然。它没有顾及读者，但又引诱他们进入。

诗作《编延》是馨的余音，是禅的空寂。多年来，元峰一直与佛陀亲近，或者是隔离，使得他的许多诗篇中自然流淌着梵音，站立禅的影子。他是精神上的禅师，他参悟的对象是现代汉语。通过汉语诗歌，通往无限的世界。在《去上海》中，他写道：“法师安慰了江南，将去云南/至于人世的纷扰，雪下了就好。”

请等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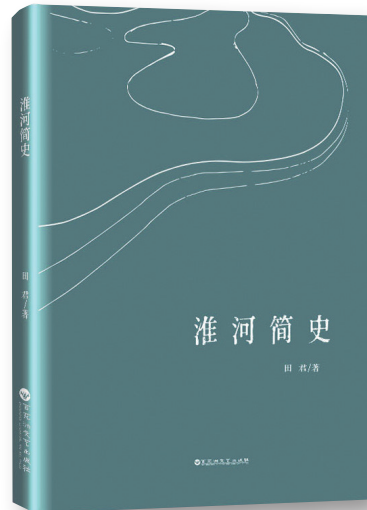
他是一个致力于“空”的诗人。他写到“菜场空了”“空庙”“空花盆”“空房子”“胃空”“空空的风声”“又搬空了”……“空”是一种交织着美丽与哀愁的存在，它有难以言说的精神场域。“空”是对未知世界的悬置，是对沉默世界的敬畏。“空”是一种存在，不是“没有”“空无”或“虚无”，不是否定性术语，正如铃木大拙所言：“它是使一切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纯粹是来自东方的个人体验，“空”包含了整个世界，同时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事物之中。“空”是元峰精神之瓮的核心载体，它是我们进入元峰诗歌水域的一条孤舟。

诗人杨健说，元峰的诗歌是“幽人”诗。我们能在诗集中发现那个在荒花与树下的幽人，是的，元峰是“一个谦卑不开花的人”(《惊变》)。他深挖“罪犯的秘密小于国王的秘密”，他在有形世界的边缘窥视无形世界的秘密。“幽人”是不求知音、一意孤行的，元峰诗歌的格调中包含着“羞涩之美、幽独之美和孤冷之美”。我们能在他的诗歌中读到羞涩之后的惊惧，幽独之后的惶恐，孤冷之后的不安，他羞涩的诗歌美学淡泊而幽远、静默而激烈。

元峰的诗歌拒绝“循规蹈矩”的美、表象世界的美，而努力营造奇诡的思想之美、一种深入世界水底的潜流之美。他自言：“我的诗不追求美。只要求写作的时候能够得到彻底的孤独，让属于我的汉语有勇气显现。如果你从中读到了美，就是对我很孤立的存在的称颂。”我们能读到这种孤寂的美，我们愿称颂这人世间单数的美。作为一个卓尔不群的批评家，元峰指出汉语的本质：“汉语在工具性盛行的年代依靠孤立的个体显现其美的本质。”通过《月亮以各种方式升起》，他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从集合体出走的个体，调整其存在的精神格调并自愿成为汉语的安身之所。”

执水之手 长河史诗

□ 赵凯



偏爱短诗，易记诵，可口口相传，传播广泛则产生影响，是成功捷径。我读过的长诗，有《荷马史诗》《浮士德》《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王贵与李香香》。好久没有读过长诗了，现在还有人写长诗吗？河南信阳诗人田君赠我《淮河简史》，掩卷慨叹，淮河就当以长诗颂之。

印象中，淮水是条有头无尾的龙，没有终点的河，左有黄河，右有长江，夹在中间，存在感不强又特别突出。少小时误以为江南才是南方，后来地理课说淮河秦岭划分华夏之南北，一下子替淮河感觉到很硬气，泱泱神州，以我为界。

如果真有河神，淮之河神必视田君为好孩子。以诗史淮，翻开每一页都不会让你失望。“捞起深埋于河床下的先人骸骨，像捞起船锚——启航，因为用力，水绷紧全身的肌肉。”长诗《淮河简史》并没有因为篇幅长而冲淡了诗意，其诗意之美，美得震撼！“夜晚的大幕被晨曦徐徐拉开/大地，一张斑驳的土窑纸上/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高悬空中/每一笔都力透纸背”。河流书写，可以散文，可以小说，但从文学史角度看，以诗歌为正源。

《淮河简史》的结构凸现了建筑美学，每页一节，清白匀称，一节七行，言简意赅。长诗似长河，“上游篇”“中游篇”“下游篇”，从“淮河源”到“入海口”，如淮河千回百转，游览了地理的“淮上第一城”，邂逅了历史的“桃花夫人”，也写到了支流们、行蓄洪区、流域海拔最低外，还有黄河夺淮、黄泛区、水之劫、洪泽湖、洪水控制工程、那些叫闹的门，以及苏北灌溉总渠。读之，就是和诗人一同走淮河，这首诗到达了它的一千零七十八公里，这条河终结在它的一千零七十八行。

执水之手，这部长诗流淌着情思之美：“一条河的锥形得以形成，河床就是它的宿命，水被塑形、扭曲、堰定，随涛就势，左冲右突/原来，每一滴雨都是一个源头”“淮河等待涛水的到来，‘涛’是一个专门用于这

条河的宇，先人们借以表达以水为师。”

“养水为患，水的恐怖主义”，这是说发生在动荡年代的水库溃坝灾祸，“死神的血盆大口，水成为獠牙，黑无常是夜，白无常是水//唯愿今日的祥和之水，永远只用于美好的事物”。诗笔探入了社会人心处。我从从来不曾自己当作诗人，很少写诗，但曾同同学田君的《淮河简史》，让我有话想说。他描述的淮河像所有的河，象征所有的河流，比如我家的大运河。2017年夏天，我们在北京毕业分手，整整一年后，他就开始考察淮河。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我考察的是辽河，我写的是散文《大辽河中》。我们有相同的共鸣：“与水为伍，与鱼为邻，没有哪条路能比河流更为柔软。”我写过散文《想捞大鱼的孩子》《路总是跟着河走》。书写河流，是文学的根，是艺术之本。古有《淮南子》，今有《淮河简史》。我仿佛听到了淮河方言：“淮河带来的中原古音。”“长途跋涉的水，却怎么也不可能再回到她的上游，我们彼此都不会再遇见同一个彼此”。“淮河水在入海口慢慢变成变色，如同人到中年的日常生活，在不经意间就已海天一色。”

一个人与一条河流的关系：“使我想到潜伏在自己身体里的动脉静脉，我不过就是它的一条分支”。生命诞生于水，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一个庞大的家族，水的母系社会”，诗人不负哺育他的这条大河：“淮河慈悲给我一生一世滋养，因此我们以母子相称。”这是河神代表我生感世感，代表地域抒怀，像捧哈达一样，把河流举过头，顶礼膜拜。

黄河有《黄河颂》，长江有《长江之歌》，千里长淮应该有自己的风、雅、颂。每一条河流都应该有一部史诗，《淮河简史》就是。淮河不在我身边，从此，淮河镶嵌在我的文学记忆，闪烁光芒。